

地域认同与社会交往

DIYU RENTONG
YU SHEHUI JIAOWANG

WULU MUQI
DE ATU SHIREN

——乌鲁木齐的阿图什人

阿布都哈德◎著

中央民族大学
China Minzu Univer

地域认同与社会交往

——乌鲁木齐的阿图什人

DIYU RENTONG

YU SHEHUI JIAOWANG

WULU MUQI

DE ATU SHIREN

阿布都哈德◎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域认同与社会交往：乌鲁木齐的阿图什人/阿布都哈德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1

ISBN 978 - 7 - 5660 - 0622 - 6

I. ①地… II. ①阿… III. ①维吾尔族—社会心理学—研究—乌鲁木齐市 IV. ①C91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705 号

地域认同与社会交往

——乌鲁木齐的阿图什人

著 者 阿布都哈德

策划编辑 吴 云

责任编辑 满福玺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622 - 6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疆民族研究丛书

主编 杨圣敏

本丛书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资助出版

基地学术委员会

杨圣敏 马 戎 郝时远 李 强
李培林 厉 声 卓新平

总 序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区，有 166 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四个半日本。这片辽阔的土地，自古就是来自各地的多民族辗转迁徙和交错聚居之地。

如今新疆世居的民族有 13 个，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新疆的 2264 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 62%。今天，当我们从人类学视角探讨新疆这些民族的特点时，有如下几个基本的认识是我们开展研究的起点。

人类不同人群的本性是相同的，即按照不同性别、地域、时代、年龄、国家、民族、种族等划分的人群，其本性都是相同的。我们既反对体质上的种族主义，也反对文化上的所谓不同民族天生既有高低贵贱之别的说法。

也就是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山西人还是云南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老人还是年轻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维吾尔人还是蒙古人，黑人还是白种人，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儒家说“人之初，性本善”，法家说“人之初，性本恶”。不管怎么说，人之初本性都是一样的，这是古人都清楚的道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承认人类本性的一致性，我们就没有人类学，就没有社会学，我们就没有国际上大家通用的人类学理论，也就没有普世的社会科学理论。但人为什么有千差万别，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民族为什么又有千差万别，不同的特点？

古人说是因为“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类不同群体、民族之间特点上的差别，都是由于其所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特点被我们称为不同文化，不同文化都是为了适应所处的自然或社会环境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风俗，不同的社会制度，就是适应不同环境里生存的方式或生存的工具和手段。

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风貌，是由其数千年的社会环境以及当地独特的自

然环境塑造出来的。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各民族又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创新发展着他们的文化。我们称之为“文化变迁”。

从以上的认识出发，我们对新疆各民族特点的研究，就要以他们的历史，所处的自然环境为背景，集中于他们与当代社会环境之关系的描述和探讨。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两种途径，即创新与传播。我们常说的世界文明四大体系即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四个创新之源。从地理位置上看，新疆距这四个文明中心都比较遥远，自古是一个偏僻之地。从文化的创新上来讲，新疆确实无法与任何一种文明的核心地带相比拟。但新疆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自古是四大文明汇聚之地。季羨林先生甚至说，新疆是世界上唯一的四大文化体系汇流之所。^①这应该是新疆各民族传统文化都有博采四方、斑斓多彩的原因吧，而四大文明的文化是由来自各处的众多民族携带而来并在这里碰撞融合的。

早在公元前二千年，这里就相继有吐火罗人、塞种人、羌人、汉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蒙古人等数不清的氏族、部落和民族来往或定居于新疆。新疆的自然环境辽阔多样，自古就分为天山南北两个世界。

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惊沙大漠之中和大漠边缘星星点点分布的绿洲上掩埋着无数农业城邦国的遗址。在公元840年回纥人自蒙古草原西迁到新疆以前，南疆的居民主要使用吐火罗语（分为古代和田语和焉耆—龟兹语两种）、汉语、古代藏语等7种语言、24种文字。公元10世纪以前，新疆的居民主要信仰萨满教、祆教、景教、摩尼教、道教等，最流行的是佛教。至今我们还能见到遍布于南疆各绿洲上和沙漠中的佛教遗址。鸠摩罗什、玄奘等高僧大德的事迹以及他们留下的经典至今还在向我们证明着当年各城邦中佛教的盛况与经济的繁荣。但曾在南疆古代居民中流行的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等多种古文字却大多已成死文字，今天只能靠少数专家解读考古发掘出的残破文书开展研究，给中外的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学者们留下了无数需要探索的秘密。

北疆的自然风貌则是草原戈壁，自古是游牧民族南来北往、盘马弯弓

① 刘逊、刘迪著：《新疆两千年》，季羨林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8年版。

之地。曾相继在这里称霸的马上民族有乌孙、匈奴、突厥、契丹、准噶尔蒙古部和满族人。匈奴铁骑经这里西迁至欧洲以后，曾在公元4—7世纪造成了震动全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彻底改变了欧洲各民族分布。公元8世纪以后开始从这里逐渐西迁的西突厥则在今中亚至小亚细亚一线改变了沿途数十个民族的面貌，使他们逐渐突厥语化，原来的马上民族突厥人则分别与沿途的土著人融合，变成了今天这些大多以农耕为主业的数十个突厥语族民族。

要解读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和形成的原因，除了追溯历史之外，还要从当地的自然环境特点这个角度探讨。他们的文化面貌，也是世世代代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的结果。

新疆气候严酷。按照联合国的相关标准，新疆1/3属于半干旱地区，2/3属于干旱地区。北部冬季严寒达摄氏零下30多度；风沙盐碱，酷热干旱则是南部的常态；东南部的吐鲁番等地夏季达摄氏零上40度，是全国最炎热的地方。新疆地域辽阔，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2人，远低于全国平均119人的水平。从这个数字看，可谓人烟稀少。但是新疆境内90%以上是沙漠、戈壁、雪山等人类难以生存之地，95%的人口集中居住在占国土面积8.22%的绿洲上（其中天然绿洲4.47%，人工绿洲3.73%）。在绿洲上，人口密度高出全国平均人口密度近一倍。因此，从这些数字看，新疆又是贫瘠的、拥挤的。与其他地方相比，当地的民族并没有因为人口稀少而较少争夺资源的竞争。但从可开发的远景来看，新疆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新疆目前已发现的矿产有138种，保有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10种，居前10位的有58种。例如，全国耕地储备的总量上限为2亿亩，其中新疆就占了1/4。新疆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达300亿—500亿吨，约占全国的1/4（天然气年产240亿立方，占1/3），煤炭储量21900亿吨，约占全国储量的40%；棉花产量居全国第一位，约占全国产量的30%多。因此，新疆被称为我国西部开发的支柱；整个国家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基地。^①干旱的环境，严酷的气候，丰富的资源，多样的地理面貌给新疆各民族文化特点以重要影响。

对于新疆各民族来说，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冲击，比自然环境有更大的影响。

① 《腾飞三十年：1978—200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编印，2009年。

新疆虽然地处亚洲内陆，中国西北角的偏远之地，近一百多年来，却多次发生震动中亚和全中国的事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新疆的发展和变化又多次引起全球的关注。

新疆在从公元前几个世纪起至明清之际的近两千年中曾一直是世界性的商贸之路的必经之地。东来西往的商旅和中介贸易曾给这里带来了千年的繁荣。自明清以来，虽然由于海上交通和其他陆路交通的日益发达，新疆在东西经济政治交往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要冲地位，而成为偏处一隅的穷乡僻壤，但这里自古是我国西部国防的屏障。近代以来，沙俄政府、英印当局、中亚一些野心勃勃的军阀，甚至远在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政府都曾试图染指新疆，在这里扶植傀儡，煽动分裂，直至直接的武力入侵。新疆的大片土地曾多次被外敌侵占，各民族人民也多次遭受外来侵略者的蹂躏。因此，保卫新疆与维护新疆的安定自然也一直是百年来学界关心的话题之一。

到了21世纪，新疆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再次凸显。一方面，加快新疆的发展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她与中亚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蒙古等多国接壤，目前又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通道和枢纽所在。同时，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新疆的觊觎和在新疆民族中煽动的恶性事件也不断拨动着中国与世界的神经。

新疆民族多彩的文化，当地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激发着研究者的热情。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新疆吸引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于是有关新疆民族的各类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把新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但以往有关新疆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等角度，从民族学、社会学角度的研究较少，也就是关于新疆各民族当代社会状况的研究较少。从研究的方法和资料来说，以往多属于文献研究，而以第一手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较少。特别是反映当前社会，各民族基层的生产生活、民族关系、发展道路等状况的著作很少。

本丛书收录的著作主要针对当代新疆维吾尔等民族的社会，是以作者亲身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从民族学、社会学角度开展的研究。

笔者从事新疆民族的教学与研究30年来，曾先后指导过数十位研究生以新疆民族社会为调查研究的重点。在指导论文时，要求学生主要的研究

资料必须是个人实地调查所得。这些研究生深入当地少数民族社区同吃同住几个月至一年以上,以这种方式开展实地调查。调查对象涉及农民、牧民、干部、城市市民、宗教职业者、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等各行各业人士。主要研究的问题有妇女、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地域与民族认同、体质特点与族源、民族关系、儿童教育、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

其中首批入选本套丛书出版的有王海霞、张国云和阿布都哈德等人的著作。他们几位都精通维吾尔语,在实地调查了一年甚至一年以上。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以后,他们又在原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沉淀思考,针对不足之处,再次或多次赴实地补充调查,并经多次修改和充实而定稿。笔者本人组织几位年轻教师和多位研究生深入一个维吾尔村庄两年的实地调查所写的民族志,也收入第一批出版的著作。

民族学研究的宗旨之一,就是促进不同文化的人群、民族之间能够互相沟通和理解。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这些第一手的详细描述,将新疆少数民族真实面貌的各种细节,特别是将他们的文化特点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展现给读者,使读者不再把这些特点看成不可理喻的奇风异俗,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

民族学的研究不仅要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还要推动社会的进步。我们将研究的成果呈献给社会各界和政府,希望能够为他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些民族和社会的真实面貌提供参考,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制定更进步的政策和前进的方向。

我们的实地调查与研究还有学术上的目标,即通过这些案例的积累,希望最终能够归纳出有关这些民族、族群的规律性理论,为民族学的理论创新添砖加瓦。

人类的本性是相同的。不同人群,如果他们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基本相同,其文化、观念、行为规范等也往往是相似的。因此,这套丛书,虽然仅仅是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开展的研究,相信在此调查中总结出来的道理,对于认识世界其他处于类似环境中的民族也有解释和借鉴的意义。为了以上目标,我们将不懈地努力。

杨圣敏

2015年6月

前 言

本书是一本基于主体人类学视角的田野民族志。

通过对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社会的观察，发现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比较注重同乡关系，很多人的社会关系“重心”限定在地域群体内，并在一些重要的社会交往领域，如仪式性交往（婚丧嫁娶等仪式）、情感性交往（挚友圈的活动）以及为获取一定社会资源而进行的“目的性”（工具理性）交往中，以同一地域为背景的同乡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中被重点“利用”的关系。人们在地域认同观念下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此来谋求、维护一定的社会资源。除此之外，社会个体的地域属性、地域背景也成为区分社会个体的一种社会标签。

以地域为背景的社会群体，是观察维吾尔族社会结构（地位、角色与群体等）的一个角度。地域群体的社会交往行为为观测“社会行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宽广的“视角”，同时为探讨人类学有关“认同”的理论及社会学与人类学共有的理论命题——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

笔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探讨与解释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展开的，以民族志的描述方式，选定一个特定的地域群体——乌鲁木齐的阿图什人，先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地域认同观念进行了“素描”，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解析出同乡人的“社会交往模式”，以此来解释社会个体的社会交往行为。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文本描述，采取民族志式的描述方法，尽量借鉴解释人类学的表述理念——文化承载者“自我”表述为主进行描述。

通过调查研究，笔者认识到乌鲁木齐维吾尔族社会的同乡关系网络及其交往方式是社会个体原属地域社会关系网络的“复制”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地缘是血缘关系的投影。”这个关系网络的

核心仍然是原有村落的血缘关系，“同乡人”到了异地，对“外”以“地域”区分，对“内”则以“村落”相区分。社会交往也最终限定在同村人中，交往准则是血亲义务（不苛求回报的互惠互助）的扩展。交往模式是“传统仪式”。传统仪式是社会交往行为的“蓝图”与“解释体系”，并使社会个体的行为处于他者可预测的范围内。

通过对地域认同观念影响下的同乡群体的社会交往行为的“因果”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新疆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灾害）、环几个盆地的大沙漠小绿洲和绿洲间漫长的距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曾长期造成文化甚至种族的半隔离状态，促成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又综合反映在一个个的自然村落中，最终导致村落边界的形成并建构和强化了村落认同，家族/血亲内婚制、村落内婚制，即是村落认同的结果，又是促成因素。然而，历史上丝绸之路（贯穿所有绿洲）“融会贯通”东西方文明的文化整合、新中国成立后语言文字的统一规范、西方民族观念的传入、民族政策等诸多因素，又是导致从地域认同向民族认同不断“超越”的根源。

通过这项研究，获得的启示是：指导社会个体产生社会行为的观念体系，是由种种复杂因素综合促成的，很难产生穷尽的理论解释。因此，精细的民族志仍然应该是人类学的重点产品。

目 录

绪论	(1)
一、研究的问题	(1)
二、研究缘起	(2)
三、选题的意义	(4)
四、相关文献及研究动态	(5)
五、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7)
六、调查地点与调查对象	(12)
七、关键概念解释	(13)
第一章 地域认同与维吾尔族文化的多元异质性	(16)
第一节 维吾尔族地域认同现状	(16)
第二节 地域认同的根源：维吾尔族文化的多元异质性	(22)
第三节 对阿图什地域的认知	(28)
第二章 “他者”眼中的“我”	(31)
第一节 普通人的观点	(32)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观点	(32)
第三节 媒体中的阿图什人	(34)
第三章 观念中的我	(38)
第一节 “我”的地域观：“什么地方的人 才算真正的阿图什人”	(38)
第二节 “我”是什么样的人 ——观念中的我	(39)

第三节	“我”与“乌鲁木齐人”的同与异	(61)
第四节	乌鲁木齐市阿图什人的婚姻观	(68)
第五节	对“观念中的我”的梳理	(75)
第四章	“单位”社会内的地域认同关系	(77)
第一节	“yigit bexi”(仪式主持人)	
	视野中的“各地人”	(78)
第二节	单位内的同乡关系网络及社会交往活动	(84)
第五章	知识分子、高校大学生、干部当中的地域认同	(90)
第一节	知识分子当中的地域认同	(90)
第二节	大学生的地域认同观	(95)
第三节	领导干部阶层的地域认同	(97)
第六章	文艺界的同乡认同	(104)
第一节	“游阿图什”活动所引发的地域认同	(104)
第二节	“阿图什的麦西来甫”和“游阿图什”	
	的一些主要内容	(105)
第三节	由地域认同到民族认同的升华	
	——“诺茹孜在阿图什”	(106)
第四节	文艺界的个人活动	(107)
第五节	简单思考	(107)
第七章	阿图什商人的地域认同	(109)
第一节	阿图什商人何时来到乌鲁木齐	(109)
第二节	阿图什商人在乌鲁木齐的“居住格局”	(110)
第三节	阿图什商人从事的行业	(110)
第四节	商人的合伙人及雇用者	(111)
第五节	商人之间的“茶”	(111)
第六节	商人之间的互惠	(112)
第七节	商人间的“mirasse”(经济协调)	(115)
第八节	商人的捐助活动	(116)

第八章 阿图什人在乌鲁木齐开办的企业	(126)
第一节 企业家克里木阿图什	(126)
第二节 新疆伊合拉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1)
第三节 乌鲁木齐安淇拉商贸有限公司	(133)
第九章 对阿图什人地域认同观念产生根源的探讨	(136)
第一节 文化十字路口	
——阿图什的历史文本与地域	(138)
第二节 离开本土	
——恶劣的生境导致的生存欲念	(144)
第三节 与“他”者的互动	
——地域文化的再生产	(150)
第十章 解读阿图什人的社会交往行为	(164)
第一节 社会交往何以可能	(164)
第二节 以村落为“核心”的社会交往	(166)
第三节 “ademgerqilik”（做人）与维吾尔族	
传统的社会交往模式	(169)
第十一章 最后的思考	(171)
参考文献	(175)
附录	(182)
后记	(194)

绪 论

一、研究的问题

概括地说，笔者准备探讨的问题是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的地域认同观念。

乌鲁木齐维吾尔族除以“南疆人”“北疆人”相互区分之外，又按行政区域彼此区分为哈密人、吐鲁番—托克逊人、乌鲁木齐人、克拉玛依人、阿尔泰人、伊犁人、库尔勒人、阿克苏人、阿图什人、喀什人、和田人等。在此基础上行政区域内部又以市、县、乡、村等更细的相互区分（行政区域内的“小地域”区分又受历史上地域认同的影响）。同一地方的人相互来往密切，形成了“地域认同”观念下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笔者称为“地缘群体”。另外，每一个地域内不同的地域文化使每一个地缘群体内的个体呈现一种“地域身份”。“地域身份”在维吾尔族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标识。这种社会标识对维吾尔族的社会交往实践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明确地体现在以共同地域为背景的人形成的持久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在更深层面上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往时判断“他者行为模式”的一种“评判标准”或者“社会预测”。也就是说，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打交道时头脑里已经有一个比较成型的先入为主的“某某地方的人是什么样”的知识或经验积累，并根据这种“知识或经验”采取进一步的交往策略。“地域身份”甚至影响到新疆各级组织及人事部门分配社会资源时的“潜规则”。“地域身份”不仅是对××地方人“集体文化性格”特征的归纳，而且是反观××地方人的“个人品质”的根源。

地缘群体、地域身份及其社会影响因素成为一种“显”的“社会事

实”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仅从笔者认识到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对维吾尔族社会的“影响力”而言，“地域群体”是深入了解维吾尔族社会结构的重要切入点。

因学识所限，笔者欲把探讨的范围限定在对“地域群体”社会交往实践的“民族志”式的人类学描述与必要的理论解释中，同时把关注对象“控制在”一个地域群体——“阿图什人”。当然，这些探讨还要涉及当前都市化背景下（作为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社会交往中的“老乡”认同及其关系网络（“老乡”关系是怎么建构的？其认同的内容是什么？认同内容如何从“物质”层面到“观念层面”？如何又从观念层面到行为层面）。在这些问题中，讨论的重心是“老乡”观念与意识前提下的维吾尔族现实社会交往的网络结构、内容、功能、建构与维护过程及其对维吾尔族整体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

二、研究缘起

此问题的提出与笔者的一些特殊经历相关：笔者出生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塔什店煤矿，父母是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人，父亲是拜城县赛里木乡人，母亲是拜城县克孜尔乡人。在笔者的童年时代，家人常被外人称为：“ixek khetighi ixken saramlikh”（直译为喝驴奶制成的酸奶的赛里木人）、“pomqukning balliri”（直译为地主的后代）。因父母的“阶级成分”高（父亲是富农，母亲是地主），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很多人对我们则另眼相看。当时同我们家“友好”来往的人除一家亲戚外，主要还是同乡拜城人，交往范围甚至“延伸”到几十公里之外的焉耆县县城、包尔海乡、七个星乡、四十里城子镇及博湖县。上述每个地方都散居着一两家拜城县人，虽然相距较远，可他们都彼此保持往来。我父亲经常提起他在“落户”煤矿前的一些经历。他曾在20世纪50年代去过两次乌鲁木齐，当时他把在乌鲁木齐“每个角落”工作或生活的同村老乡都找到并拜访过。当时我幼小的心灵形成的印象是：除亲戚外，同乡人就是最亲的人，而且在我们家人的观念里拜城人是最善良、最质朴、最值得信赖的人，拜城没有奸诈狡猾的人。这些观念对笔者的影响很大。